

中國散文通史

郭预衡 郭英德 总主编



宋金元卷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李真瑜 田南池 房春草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2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國散文通史

郭预衡 郭英德 总主编

宋金元卷

李真瑜 田南池 房春草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散文通史·宋金元卷 / 李真瑜,田南池,房春

草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336-7190-7

I. ①中… II. ①李… ②田… ③房… III. ①古典散文—文学史—中国—辽宋金元时代 IV. ①I20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3892 号

书名:中国散文通史·宋金元卷

作者:李真瑜 田南池 房春草

出版人:朱智润

策划统筹:张丹飞 张 利

责任编辑:王 骏

版式设计:朱 锦

装帧设计:张鑫坤

技术编辑:王 琳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邮编:230601)

营销部电话:(0551)63683010,63683011,63683015

排 版: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0551)65859480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720×1010 1/16

印张:31.75

字数:460 千字

版次: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36-7190-7 本卷定价:138.00 元(全套定价:149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上编 宋代散文

绪 论	001
第一章 宋代论辨文	007
第一节 北宋论辨文	009
第二节 南宋论辨文	025
第二章 宋代奏议文	033
第一节 北宋奏议文	034
第二节 南宋奏议文	043
第三章 宋代书序文	056
第一节 北宋书序文	057
第二节 南宋书序文	078
第四章 宋代杂论及试策文	099
第一节 北宋杂论及试策文	100
第二节 南宋杂论及试策文	106
第五章 宋代传状文	108
第一节 北宋传状文	109
第二节 南宋传状文	120

第六章 宋代杂记文	133
第一节 北宋杂记文	136
第二节 南宋杂记文	159
第七章 宋代杂事文	175
第一节 北宋杂事文	176
第二节 南宋杂事文	192
第八章 宋代碑志哀祭文	204
第一节 北宋碑志哀祭文	205
第二节 南宋碑志哀祭文	208
第九章 宋代辞赋文	212
第一节 北宋辞赋文	213
第二节 南宋辞赋文	218
第十章 宋代铭颂文	222
第一节 北宋铭颂文	223
第二节 南宋铭颂文	229
第十一章 宋代赠序文	234
第一节 北宋赠序文	235
第二节 南宋赠序文	239
结语	242

下编 金元散文

绪论	245
-----------	-----

第一章 金元论辨文	248
第一节 金代论辨文	250
第二节 元代论辨文	260
第二章 金元奏议文	290
第一节 金代奏议文	291
第二节 元代奏议文	300
第三章 金元书序文	313
第一节 金代书序文	314
第二节 元代书序文	322
第四章 金元传状文	358
第一节 金代传状文	359
第二节 元代传状文	364
第五章 金元杂记文	377
第一节 金代杂记文	378
第二节 元代杂记文	387
第六章 金元碑志文	403
第一节 金代碑志文	404
第二节 元代碑志文	411
第七章 金元辞赋文	426
第一节 金代辞赋文	427
第二节 元代辞赋文	432
第八章 金元铭颂文	452
第一节 金代铭颂文	453
第二节 元代铭颂文	456

第九章 金元赠序文	464
第一节 金代赠序文	465
第二节 元代赠序文	468
第十章 金元哀祭文	481
第一节 金代哀祭文	482
第二节 元代哀祭文	487
结语	495
参考文献	496
后记	501

有宋一朝三百二十年(960—1279),分为北宋、南宋两个时期,恰好处于中国历史由中古向近古转变的阶段,在疆域版图、综合国力和军事态势上,虽远不能与汉、唐盛世相提并论,但在文化建设学术思想的发展上却呈现出承先启后的繁荣气象。

在北宋初期的七十余年间,晚唐五代以来的柔弱绮艳文风相沿成袭,无法扭转。但是也有人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反对五代旧习,力图改变文坛风气。他们从文章入手,以写作“古文”相互号召,以图重建儒家的“道统”和“文统”。或学韩愈古文,以六经为范本,强调文学的道德教化作用;或以儒为主而兼容老庄,力求融儒家理想于道家风范之中。

而宋代文风的真正转变则是以北宋中叶的诗文革新为起点的。尽管在此之前就有一批作家致力于提倡古文,力图变革文风,如柳开、王禹偁之辈,但直到诗文革新的兴起时才出现了根本的转机。宋代的古文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唐韩柳古文创作思想和创作实践的发扬与光大。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北宋古文六大家,以韩愈的“文以明道”为宗旨,强调文学的政教作用,要求文学承担起道德才华和政治变革的重大使命。所不同的是,以韩柳为代表的唐代古文创作的目标还只限于文章,而且没有能够真正收到摧枯拉朽的战果,相反,韩柳之后,文坛主流反而再次被骈文所取代。而宋代的古文运动由于有三苏、王安石与曾巩等大家的加盟,不仅造成了极大的声势,并且切实推动了宋代古文创作的极大繁荣,从而最终奠定了古文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不可动摇的正统地位。

另外,北宋的诗文革新之所以能够取得比唐代古文运动远为辉煌的

成就,除了“明道说”的发展能与当时社会的政治改革紧密配合而适应历史的需要以外,更在于宋代的古文作家在各自具体的创作实践中,能以各具鲜明创作风格的优秀作品体现散文发展自身的规律和要求。如文坛领袖欧阳修散文中那种前人所没有的纤徐委备的节奏感和俯仰自得的情趣,不但被时人盛赞为“六一风神”,而且极大地强化了古文独特的抒情魅力,从而使其具有鲜明的个性风采。在欧阳修的巨大影响和极力扶持下,风格迥异的作家与作品层出不穷。苏氏父子的汪洋恣肆、雄奇奔放,王安石的拗劲峭拔,曾巩的严谨平实……这些异彩纷呈的古文作品具有深远影响。这场诗文革新在散文领域所达到的成就使得古文体裁焕发了长达千年的创作青春,使其成为描述客观现实与展示作者内心世界的最佳艺术样式,将叙事、评论和抒情写意完美地融为一体,具有极强的实用价值和极高的文学价值。

北宋文坛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宋代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和苏轼,具有前人所不具备的多方面修养与风度,甚至是一身兼具政治家、思想家、诗词家、文章家等多重身份。从立朝之初,宋代统治者就将文化建设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每年科举考试录取的名额大大超过唐代,并且采取了诸如殿试、糊名、眷录等一系列措施,取消了门第、乡里的限制,在录取标准上尽可能做到一视同仁,使得众多读书人的仕途空前通畅。北宋名家范仲淹、欧阳修等都出身寒门,全无根基,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最终成为北宋政坛名臣和文坛巨匠,这在唐代是不可想象的。另外,宋代统治者还十分重视图书的收集、整理。宋太宗下诏令文臣编纂图书,先后完成《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太平御览》、《道藏》等大部头的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为有宋一代的文化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刻苦读书是宋代文人的普遍风气,这当然与科举考试以诗文取士有着密切的关系。苏轼、黄庭坚等人更是明确地把刻苦读书作为文人必修的“功课”。他们所津津乐道的“学问”,不仅是指读书时能够融会贯通前人的各种知识和创作技巧,以丰富自己在遣词造句时的素材,而且更主要是着眼于品格的陶冶和胸襟的养成。宋代之后新儒家的出现,又强调了主体内在心性的体认和反省。所有这些,对一个文化空前繁荣的朝代而言,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和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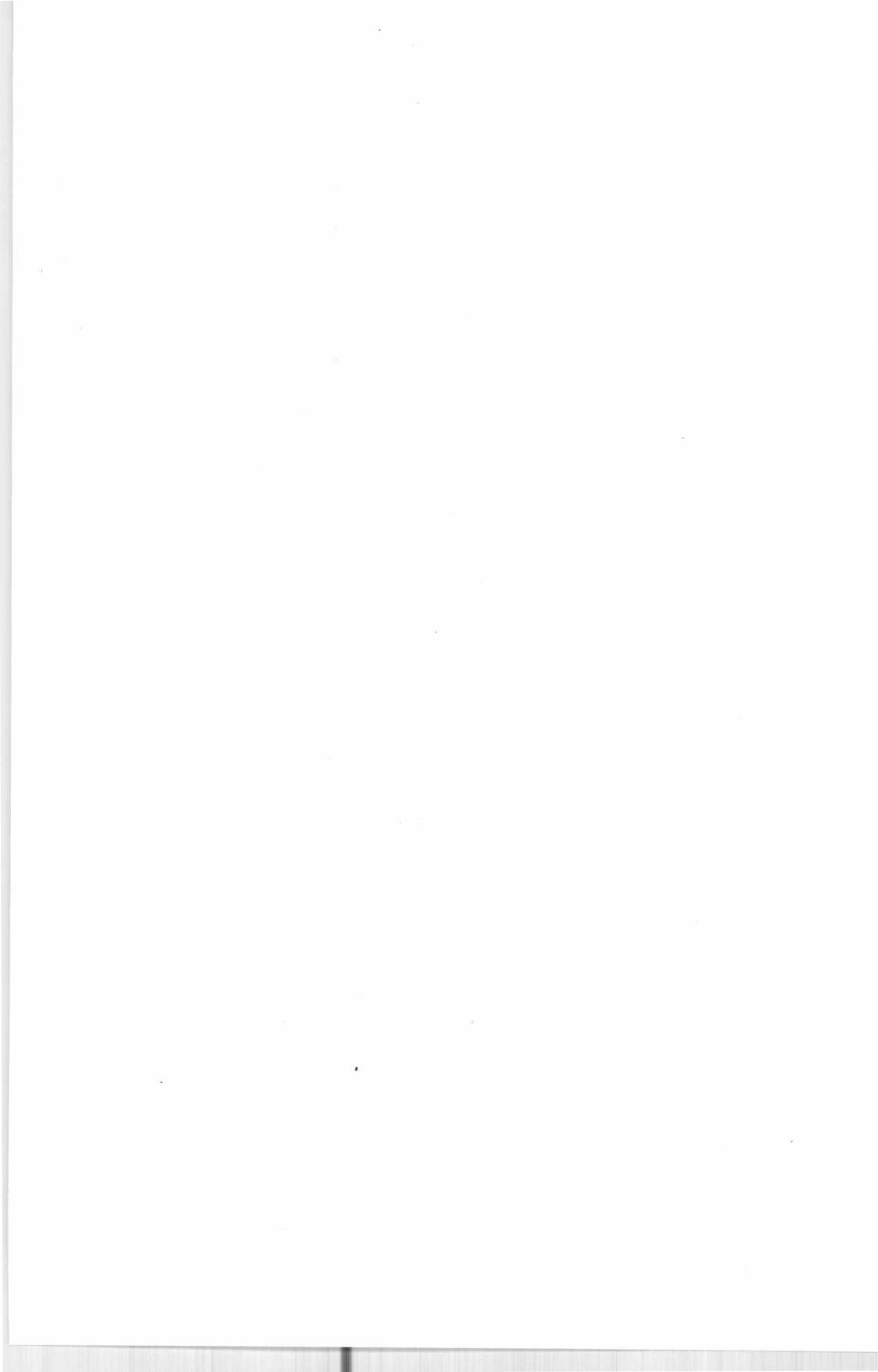
动作用。

北宋文章大致可分为三类,到熙宁变法前后已初见端倪:以王安石、司马光为代表的论事之文;以周敦颐、张载、二程为代表的讲学之文;以欧阳修、苏轼为代表的文士之文。

南宋之初,国势艰难,风云际会,文章转折。无数文人学者,包括太学诸生,都倡言国是。因为恢复中原的理想和雄才大略难以实现,他们义愤填膺,所发政论与议论,皆慷慨陈词、理直气壮。北宋初年以来形成的文人好发议论的传统,得到了发扬光大。而随着偏安局面的形成,文风日趋浮艳,不过理学的兴起,却使得在北宋表现为政治改革的经世之文向道德教化的方向转变。正心、诚意成为士大夫的口头禅,也成为一般文人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必修课。理学大师朱熹已不赞成事功之说,对古文家为人为学不符合儒家道德伦理规范之处提出强烈的批评。在南宋后期,由于得到宋理宗的肯定和表彰,程朱理学成为官方正统哲学,其文亦大行于世。在偏安之局,“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社会风气中,儒者讲学、文人立说,似乎也呈现出一派兴旺气象,特别是各体杂文、小品层出不穷、风格各异,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学术风气以及南宋文人墨客的生活情调,颇有时代特点。

亡国之时,悲壮呐喊,如文天祥,虽其一生业绩不在文章,但其文章自有不可泯灭的光芒。不少志士文人写于国破家亡之际的作品,虽成就各有高低,但悲歌慷慨,自与此前之文迥异。宋亡之后,若干遗民文士,放浪于山水之间,寄情于诗文之中,凡所创制,亦颇为耐读。

上编 宋代散文



第一章 宋代论辨文

从北宋开国到南宋覆灭，宋王朝自始至终都处于民族矛盾的困扰之中，内忧外患，经久不绝。在北宋时，统治集团内部新党与旧党之间；在南宋时，抗战派与求和派之间的争斗一直十分激烈，论说文也因此成为政治斗争、民族斗争和思想斗争的重要工具，获得空前的用武之地和长足的发展空间。加上宋代理学昌盛，说理论辨俨然成为有宋一代的风尚，这对宋代论说文的辉煌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唐宋八大家中的北宋六家，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个个都是论说文写作的行家里手，像欧阳修的《朋党论》、《本论》、《纵囚论》、《宦者传论》，苏洵的《权书》十篇，苏轼的《留侯论》、《贾谊论》等，不论是政论、史论，还是兵论、杂论，都写得雄辩滔滔，有决江河而下的气势，实为其他时代的论说文所少有。可喜的是，宋代六家在写论辨文时，并没有把它单纯地作为应用文体来对待，而是把它当做一种文学体式来揣摩，当做一种艺术目标去追求，所以写得波澜壮阔，气象万千。而苏轼与王安石各自的精心之作——《上皇帝万言书》，更是为后世注目的政论鸿文。宋代的史论也极为兴盛，这与科举考试增加了这方面的科目有很大的关系，著名的文章有苏洵的《六国论》、苏轼的《留侯论》等。史论文多不是为论史而论史，往往是作者借史讽今、表明自己的政见或志向的工具，这一点在宋代尤其明显。

南渡以后，民族矛盾更加尖锐，战和之争也日趋白热化，主战派或与主和派论战往复，为朝廷进计献策，像李纲的《议国是》，虞允文的《论今日可战之机有九疏》，陈亮的《中兴五论》，辛弃疾的《美芹十论》、《九议》，都是震动朝野的大文章。不过，与北宋六家之文比起来，这些文章急于事

功,来不及讲究文采,不免有质直、粗疏之不足,反倒是遗民邓牧等能在亡国之后做冷静的思考,写出《君道》、《吏道》等篇,既有阐释,又有惋叹,不失为精心之作。

第一节 北宋论辨文

北宋文坛，热闹非凡，首先是因为唐宋八大家中的六家是北宋人，其继承发扬唐代古文运动传统的浪潮在六大家的手中一浪高过一浪；再加上北宋政坛上，改革、朋党、变法，纷争屡起，风云不断，各种论辨之文，此起彼伏，议论迭出，使得这一阶段的散文创作在有宋一代，甚至是整个中国散文史上，都占有重要的承前启后的地位。

筚路蓝缕柳仲涂

柳开（947—1000），原名肩愈、字绍元，大名（今属河北）人。生于后晋开运三年（947）的柳开是宋初第一个学习韩柳散文，并大力推行古文创作的作家。早在宋太祖立国之后的乾德元年（963），年仅十七岁的柳开就开始钻研韩文，甚至把自己的名字都改了，“遂酷而学之，故慕其古而乃名肩愈矣”（柳开《河东集》卷五，《答梁拾遗改名书》），可见其志向之坚决。在当时，一般文人只知道研习骈俪之文，根本不知有韩愈，柳宗元，更不晓何谓“古文”。柳开“朝暮不释于手，日渐自解”，于是“深得韩文之要妙，下笔将学其文”（《河东集》卷二，《东郊野夫传》）。他写的《天辨》、《海说》、《经解》等文从题目到内容都明显受到韩愈的影响，但是他的古文并没有得到时人的赞同，反而遭到不少非难。他在《应责》中为自己辩解“子责我以好古文，子之言何谓为古文？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子不能味吾书，取吾意，今而视之，今而诵之，不以古道观吾心，不以古道观吾志。吾文无过矣，吾若从今世之文也，安可垂教于民哉！”（《河东集》卷二）他明确表示“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后来，他又改名为“开”，字“仲涂”。作为宋初第一个大力推行古文创作的他，曾解释改名、字的用意是：“其意谓将开古圣贤之道于时也，将开今人之耳目使聪明也，必欲开之为其涂也，使古今由于吾也。”（《河东集》卷二，《补亡先生传》）他于开宝六年（973）中进士，此后虽历任内外官

职，历典州郡，终于如京使，但其一生业绩，却在提倡古文。柳开曾尖锐批判晚唐五代以来流行的骈文，说这些文章“华而不实，取其刻削为工，声律为能”（《河东集》卷五，《上王学士第三书》）。但是，筚路蓝缕，柳开的创作成就并不高。柳开曾叹息说，他本以为自己“立身行道必大出于人上而遍及于世间，岂虑动得憎嫌，挤而斥之”（《河东集》卷九，《再与韩洎书》）。石介集中有《过魏东郊》诗，为开而作，推重乃不遗余力。有《河东集》，传在《宋史》卷四百四十《文苑传》。

他的《代王昭君谢汉帝疏》（《河东集》卷三）颇能代表其创作特点。文章的体裁虽是上疏，或可归“奏议之属”，但实为代拟，甚至是虚拟之作，因为他不可能代汉人上疏。此文虽明为代王昭君上疏，实为借题发挥，对屈辱求和、媚外亲敌的现行国策进行抨击，疏中无中生有的替昭君辩解，并无因“奉诏出妻单于”而有“怨愤之心”：

夫自古妇人，虽有贤异之才，奇峻之能，皆受制于男子之下，妇人抑挫至死，亦罔敢雪于心，况幽闭殿廷，备职禁苑，悲伤自负，生平不意者哉！臣妾少奉明选，得列嫔御，虽年华代谢，芳时易失，未尝敢尤怨于天人；纵绝幸于明主，虚老于深宫，臣妾知命之如是也。

此一段表白虚与委蛇，口气十分委婉而坚定地表明自己绝不怨愤，以下宕出新意：

不期国家以戎虏未庭，干戈尚炽，胡马南牧，圣君北忧，虑烦师征，用竭民国；征前帝之事，兴和亲之策，出臣妾于掖垣，妻匈奴于沙漠，斯乃国家深思远谋，简劳省费之大计也。臣妾安敢不行矣。况臣妾一妇人，不能违陛下之命也。

如果其意果真是为了表白自己无怨愤，那么以下一段恐怕就不必说了：“以安国家、定社稷、息兵戈、静边戍，是大臣之事也。食陛下之重禄，